

“西南文魁”赵以炯：崇文重教 推动变革

赵以炯与康熙年间状元曹维城、光绪年间状元麻江人夏同龢、遵义人探花杨兆麟称为清代贵州“三状元一探花”。

贵州教育先贤李端棻为此特写下一副对联祝贺：“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庐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喜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

1 书香世家：自幼聪明好学

幼年时赵以炯寄养在贵阳外陈振家，由于外公家是书香门第，加之居住南明河甲秀楼旁的宿儒名贤聚集区，使赵以炯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的熏陶。其大舅一系系道光五年（1825年）举人，镇远县教谕，二舅一系系国学生，三舅一珍为处士。这样的家庭环境，为赵以炯创造了极好的幼教条件。

赵以炯自幼就聪明好学，加之赵三大陈氏教子有方，使得赵家家风乡邻景仰。同治四年（1865年）赵以炯7岁时，随本家赵辑五发蒙。同治六年（1867年）受读于吴竹堂（登桂），其弟以燧也于同年发蒙于竹堂先生家，出生在府学庠生的吴竹堂对赵以炯、赵以燧日后成才中举影响很大。以后，赵以炯还曾受业于顾伯萝、高扬华两先生。光绪

二年（1876年），赵以炯和赵以燧二人入贵阳贵山书院深造，受教于前任贵州学政韦伯谦，并受到贵山书院黄芷衡的熏陶。在此间，赵以炯学识渐长，写出《何谓儒家之教》等心得，深得其师韦伯谦赞许。

清乾隆中期以来，从乾隆壬子年赵玉奇中举人（青岩赵氏家族第一位开科之人）起，一个家族六代人，共有廪生、庠生近四十人，举人近三十人，一位经魁、六位进士、一位状元。

赵以炯一家皆有才之人。其弟兄四人皆才子，三进士一经魁一状元，弟兄三人任职京官，加赵湘洲进士等，叔侄四五人在京任职。其姐妹赵以兰、赵以冷为贵阳两才女，真可谓满门殊荣，彪炳史册。此一现象，别说是贵州，就是中国古今也少有。



赵以炯，字鹤林，清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生，贵阳花溪青岩人。清光绪五年（1879年）中举人，十二年（1886年）成进士，参加廷试（殿试）获第一甲第一名，成为云贵两省自科举以来“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十四年（1888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十七年（1891年）任广西提督学政。二十一年（1895年）充会试同考官。二十六年（1900年）丁母忧回籍，主讲贵阳古书院。服阙入京，旋归青岩讲学。三十三年（1906年）八月病卒，葬青岩弓腰寨附近山上。



赵以炯书法作品。

延伸阅读

其父赵国澍 能文能武



赵公专祠。



赵国澍塑像。

赵国澍（1826-1863），字慰三，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青岩镇）人，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曾用石砌修补青岩城垣，对家乡屡有贡献，因功得按察使衔，花翎候选道。他能文能武，关心地方文教，严格教子。他的四个儿子中，三个中进士，其中二儿子赵以炯成为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文状元，还有一个儿子中经魁，在科举时代，可谓殊荣，为贵州前所未有。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端午节，青岩各族人民群众依照当地风俗上街“游百病”，与洋教大修院的修士发生争吵，被修士推打。赵国澍闻讯，急派团兵围困大修院，并发出驱教令。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赵国澍因青岩教案被撤职。同年四月，仍督练勇镇压农民起义军，在贵阳郊区百宜被围，逃至陈家堰时，最后战死沙场。

赵国澍死时年仅三十七岁，其葬于黔乡挖煤坑。清廷除给上述追授外，还降旨建立专祠、国史立传。后来赵公专祠由青岩民众协同赵家建成。

其母陈氏 教子有方



赵以炯状元故居内复现赵三大教子的场景。

赵以炯的母亲赵三大陈氏是贵阳南明河畔陈振公之女，在赵国澍去世之后，独自抚养四子二女成人，赵以燧进士、赵以炳举人、赵以燧进士、赵以炯中了状元入翰林，赵以炯的姐姐赵以兰和妹妹赵以冷素有才女之称。赵家因四子登科，被当地人称为一门四喜，赵三大陈氏因教子有方，被人们称为贤母。

赵三大陈氏虽出身书香门第，嫁入富贵之家，但在封建社会女人毕竟处于弱势地位，赵国澍死后，赵三大陈氏要求分家，其侄赵俭分给了赵三大陈氏一万两银子，加之清廷抚恤，赵国澍有功为太常侍卿享三品衔，其子赵以燧世袭骑都尉，在过去如果不中秀才就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考中举人可出任做官，考中进士那是人中龙凤，中状元那是天下奇谈了。

赵三大陈氏去世后，赵以炯的友人写了一副悼念的挽联：“但期远志，不寄当归，鹤发人催赴京华，岂仅仙槎希八月；已折三珠，幸存片玉，鳌头客遇还吴下，空将佳节泣重阳。”

赵以炯的好友、四川诗人知县李超琼撰有悼赵三大陈氏联：相夫著英雄义烈，教子成鼎甲科名，一门忠孝板舆来，久看彤管扬徽，人称贤母；家运摧折频仍，国步复陆唯孔亟，两载忧伤风习变，最惨麻衣入哭，我亦孤儿。

还有张之洞、李端棻等题的母祠匾“巾帼英雄”。赵三大陈氏在时因四子登科，赵以炯中了状元，诰封为一品夫人，在贵州的历史上诰封一品夫人的想来也屈指可数。赵以炯在回想兄弟成长的过程中说：全凭母教之功，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恩之情。

2 云贵首状元：夺魁绝非偶然

光绪五年（1879年）赵以炯中乡试第十名，成为举人。以后仍继续在黄芷衡、莫芷升（庭芝）等指教下继续深造。光绪十二年（1886年），赵以炯和赵以燧进京参加会试，题目为《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赵以炯所作之文本房加批为“扬之高华，按之沈实，坚光切响，无懈或攻”。赵以炯在会试中成为进士，获得参加殿试资格。在殿试中赵以炯获一甲第一名，大魁天下，成为状元。

赵以炯不仅是云贵科举史的首位文状元、清朝时期西南地区滇黔川桂渝首位文状元，更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红顶状元之一（另一位是福建的王仁川）。

明清状元大多出在江南地区，而于今第一位大魁天下的状元却是贵阳青岩的赵以炯，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使得人们对贵州文士刮目相看。时在京城任监察御史的人李端棻写下了一副楹联祝贺：“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庐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喜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

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李端棻还为贵阳名胜之一的君子亭重修竣工题写一副楹联：“游韵记芳踪，重看蓬沼波清，君子高风同仰止；秀灵钟间气，为报杏林春暖，状元及第正归来”。可见赵以炯中状元让黔人吐气扬眉。

从赵以炯苦读勤学的历程和坚韧不屈的性格可看出其以超人气学识夺魁绝非偶然。孩童时的赵以炯所作“咏刺梨”一诗，就初现过人才华：“生在山间不入盆，擅妍不肯进朱门。却和龙井酿成酒，贡上唐朝承圣恩。”

赵以炯在光绪八年（1882年）和其堂侄赵沅香步行进京应试科进士落榜后，非但毫不气馁，却坚定了其“振奋放眼量”的信心。在返回青岩继续苦读时，有一日赵以炯在家中楼上自吟：“一上上到赵家楼，目击江翰气横秋。眼前若无三山堵，看破江南十二州。”可见其胸怀远大抱负。赵以炯在保和殿参加殿试时，光绪帝出上联“东津明，西长庚，南箕北斗，谁能摘星汉？”赵以炯对下联“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愿作探花郎。”此联对仗工整贴切，久久盛传。



赵以炯状元故居。

3 贡献影响：以推动变革影响后世

赵以炯诗文俱佳，是贵州文化人中的佼佼者。他和莫友芝、李端棻、严寅亮、姚芷谷等贵州书法于清时名噪京华，是贵州书法的高峰区。

赵以炯所著《赵以炯廿时诗品》《赵以炯表圣诗品》诗两卷，所题诗序较多，有名的为《望眉草堂全集》所题诗。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赵以炯应试时所作《赋得〈报雨早霞生〉得生字五言作韵》就获“刻画工巧，灏不妄抒”的好评，其作的《中庸不可能也》一文更是得到极高评价：“绝不矜才使气而轩轾，呈露题词自阐发无遗，知洗练之功深矣。”

《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中对赵以炯的对策评价是：“今读赵状元对策，其博学多识，理密慎思，文笔流畅之处的确不亚于别的状元策。”

曾任中国驻日本公使的贵州名贤黎庶昌在《赠赵殿撰序》中说：“自顺治甲申迄于今上戊子，凡三百四十五年，举状元者九十八人，东南大省、县或至数人，而西南边徼之地至乃合数行省旷数百年而不得一与，又何其难也！”“光绪丙戌科，吾黔贵阳赵君仲堂始以状元及第魁斗天下，中外尤以为异。士在黔闻者，相以引觞称庆，有若荣宠之被其身。”“夫黔天下之右脊也，其山川清淑磅礴之气都积蓄久，而于仲堂发之。”

由此可见，博学多才的赵以炯是以厚实功底为贵州争得荣誉，用博学才智改变了士林认为

“黔无人”的看法。

赵以炯于1888年以殿撰空降四川任乡试副主考之职，为清政府选拔人才，闲暇之余主讲成都的尊经书院等，尊经书院为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与地方绅士多有往来和唱酬之合。

在四川三年任满，清政府下旨命赵以炯为广西提督学政。时年三十四岁，正处壮年之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赵以炯状元在广西任提督学政时不仅选拔了大批人才，还常去书院讲学，对当地士子举人影响较大，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到任广西提督学政的第二年，广西考取了状元刘福姚，刘福姚状元为赵以炯状元的门生。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时赵以炯之弟赵以燧从总理衙门参政到江淮上海道任职，和朝中大臣上书言事建言献策，加强海防，以防日本入侵等。1895年赵以炯入京任会试同考官，即考进士选贤任能的官员，《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赵以炯等在京官和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义愤，导致了“公车上书”产生。

当时正是思潮跌宕起伏，派系纷争交织，帝党派主战，慈禧派主和，赵以炯作为帝党派的干臣，“公车上书”虽为康有为、梁启超领头，实是朝中重臣李端棻、赵以燧、赵以炯等官幕后推动。

这一点可从参与“公车上书”的人数看出：广东省86人、

贵州95人、四川71人、广西99人、甘肃61人、陕西55人、江苏47人、直隶37人，公车上书实际举人数603人。赵以炯先后任过翰林院修撰、四川副主考、广西提督学政、贵州籍。从各省参与人数来看，参与人数广西举人最多，第二是贵州，第三是广东，第四是四川，仅此四省就占了“公车上书”人数的六分之一左右。

这幕后策划支持者和赵以炯不无关系，且康有为是梁启超老师，李端棻为梁启超叔丈，而赵以炯和李端棻私交甚好，且为同朝乡党，康有为入桂讲学时，赵以炯时任广西提督学政，没有赵以炯的支持默许，以康有为当时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可能难以立足三桂之地，所以以康梁当时的影响很难以发动全国举人参与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慈禧软禁，李端棻发配新疆，在京为官的赵以炯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百日维新失败后，1903年赵以炯辞官回乡讲学、办学，启蒙后进才俊，传播新思想，以图救国强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赵以炯于青岩家中病故，时年49岁。

现据有关专家学者研究，流传于广西、广东、福建的梁四珍和赵玉彝的故事，实为民间根据赵以炯的民间口头流传，附会改编而成，可见赵以炯在两广和福建一带的影响。



君子亭旧貌。